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社会学（第一辑）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

当代社会学学说（壹册）

〔美〕素罗金 (P. Sorokin) 著 黄文山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 社会学（第一辑）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

当代社会学学说

（壹册）

〔美〕素罗金（P. Sorokin）著 黄文山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社会学学说/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社会学)

ISBN 978-7-5520-1836-3

I. ①当… II. ①李… III. ①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0054号

当代社会学学说 (1-3册)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83.25

字 数: 110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836-3/C.128 定价: 396.00元 (1-3册 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一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三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美] 素羅金 (P. Sorokin) 著 黃文山 譯

當代社會學學說

壹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誌謝

著者對於朱賓 (F. Stuart Chapin) 教授，深感其友誼的批評與鼓勵，對於卓越的社會學者吉廷史 (Franklin H. Giddings) 和羅斯 (Edward A. Ross) 兩教授，深感其獎進之盛意。至於幫助著者，整理稿件，其功歸諸芬尼 (Ross L. Finney) 和沈摩曼 (Carl C. Zimmermann) 兩教授。本書的德文本，能够出版，則爲柏林大學著名教授杜華爾德 (R. Thurwald) 博士和卡士波爾 (H. Kasspoll) 博士之功。歐洲和俄國的著名學者，如德之魏士 (L. von Weise)，法之李助 (Gaston Richard)，意之吉尼 (Carrado Gini)，西之蒲沙鐸 (Adolof Posada)，俄之柏魯衛 (Ivan Pavlov)，和士柏杜羅斯基 (E. V. Spectorisky)，著者舉凡有所商榷，無不與襄助，尤所深感。著者以誠懇之情，感謝國際社會學學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ology)，國際社會學和社會改良學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Reform)。

德國和烏克蘭 (Ukrainian) 的社會學會，捷克斯拉夫 (Czecho-Slovakian) 的農學院，承認著者的爲各該會的會員。明尼蘇達 (Minnesota) 大學圖書館的職員，不斷地幫忙，對於本書之編述，補益尤多。最後，著者的學生，共同從事科學工作，收相互切磋之效，不可多得，均書於此，永誌不忘。

素羅金 (Pitirim Sorokin) 於美國明尼亞波利斯 (Minneapolis)

十月，一九二七。

編輯者序

研究社會學說的學者，每每陷於兩種相反的謬誤：他們對於社會現象的臆測的解釋，如不是盲從地輕易相信，便是屏棄一切的學說，謂爲非科學，而不從事實際的勤苦的探索。素羅金（S. P. Korshak）教授這本著作，正是這兩種極端的特效的消毒劑。

他由許多可靠的來源，蒐集關於社會現象的定量的資料，以冷靜的事實，攻擊虛構的臆測，供給學者以估量學說的實際的批評標準。過去的學說，不免重複的弊病，所以他說明學者在探索之先，必要深知其他學者的作品，然後蒐集事實，提出推論，庶幾不致落前人的窠臼。這書在這兩方面都能對於當代社會科學家的著作所常見的法外的謬誤，給予實質的糾正。

社會學說的學者，往往以純粹文字上的分別，爲確度的根據；這書則蒐集許多事實的與定量的資料，來試驗這些學說，所以在社會學說中，總算是唯一的著作。素羅金教授對於凡是以耳爲目

的東西，都是不易納受的。

社會學的少年學者，如果小心誦讀這本書，將不至耗費無限的時間，研究那些空中樓閣的學說，並且深知純粹臆測的理論，不免惹起邏輯的矛盾與謬誤。

除卻這些特性外，這書專研究當代社會學學說，對於社會學的科學的文獻，可算是一種貢獻。此外本書爲着要把現在的學說和過去的連貫起來，使歷史的均衡，能够保存，所以對於早先的理論的概念，也加以敘述。

其他社會科學，如人類學，經濟學，史學，政治學上的好學深思之學者，將發見這本著作對於他們的圖書館當是一種有用的增加，且可以指示當代社會學學說的價值和限度。在這方面，這種著述實在具有真正綜合的意義。

朱賓斯多脫 (F. Stuart Chapin)

孫序

近年國內出版之社會學譯本，往往發見三種缺點：第一，所譯原本，未必是名家著作。第二，譯者，對於所譯之書，未必能深切了解。第三，譯文往往有詞不達意之憾。這次黃凌霜先生所譯素羅金之當代社會學說，對於上述三點，可說毫無缺憾。我們知道，素羅金之書，為最近社會學名著之一；而黃先生對於社會學，又有深切之研究，故黃先生翻譯此書，可謂人地相宜。至於譯筆之忠實，與措詞之優美，尤其餘事。

素羅金此書之內容，我曾於一月前在社會學刊第一卷第二期，做一簡略之介紹。我在彼處曾說：「關於介紹社會思想與社會學學說的著作，約可分為三類：

- 一、為介紹普通社會思想史與社會學學說史的著作
- 二、為介紹各國社會學的著作

三、爲介紹專家社會學的著作

這三類著作，雖各有其特長；但一因卷帙太繁，二因得之不易，均足爲探討研究之梗。如能有一著作，包括有社會學以來的發展狀況，以及各國各家各派社會學的性質特點，而加以一種系統的總括的陳述，其有裨於學者，當匪淺鮮。這種著作，誠爲社會學界所需要，而十分歡迎的。素羅金此書，似足以應這種需求。」

「綜觀素氏全書，發見四點特長：

(一) 搜羅宏富 凡六七十年來社會學方面各種重要學說，幾乎無所不包。而尤特色者，爲英美德法以外諸國社會學派之敘述，如俄如意，更爲詳細。其中有許多學說及人物，爲一般社會學家向所未聞。素氏爲俄人，而對於英法德意俄等等諸國文字，無所不通；故其研讀所及，範圍極廣，幾乎爲任何社會學家所望塵不及。因此之故，該書搜羅之富，選材之博，爲現代社會學界不可多得的著作，若說除素氏以外無人能寫此類之書，要非過分之談。

(二) 注重事實 素氏頗反對一般浮面的理論社會學家，故書中所採學說，必取其近於事

實者若僅僅哲學上詭辯的議論，一概屏棄。因此統計材料，書中證引甚多。

(三) 註釋詳明 書中註釋 (Footnotes) 甚富；或敘述專家小傳，或證引參考原書，或羅列各派主要著述，使讀者尤覺便利可查。

(四) 索引詳備 書末所附索引兩種，一爲人名索引，一爲題目索引，均極詳細，有廿三面之多。人名索引，把書中所引人物一一六〇餘人的姓名，及證引次數，及頁數，羅列無遺，極便檢索。『要之，此書爲近年歐美社會學出版物中不可多得之著作。今得黃先生譯成中文，使不諳西文者，亦得讀此佳作，其有裨於學子，誠匪淺鮮。』

更有進者，我國近年社會學出版物中，似頗表現紛雜之象；往往外標社會學之名，內非社會學之實，淆亂聽聞，使初學之人，莫知去取，其危險孰甚。希望本書之出，能予國人以社會學上種種科學的概念，使能明瞭社會學的內容真相，及其最近趨勢，方不致爲一切似是而非的社會學出版物所誤，這樣纔不負黃先生翻譯之苦心，付梓在卽，故爲之介紹如此。

民國十九年二月二十日

孫本文序於南京國立中央大學